

《听漏》以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重器九鼎七簋为核心，围绕九鼎八簋缺一簋的谜团展开。《命运慢跑团》借“跑”写出当代中年人、家庭和社会的缩影，可以看作是致敬父辈的作品、对成长的思索，还可以看作是对希望的书写。本期“中国好书架”栏目精选两本获得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图书的书评，以饕读者。

历史迷雾中的文化守望 ——读刘醒龙长篇小说《听漏》

◎ 诸纪红

刘醒龙，这位来自湖北团风县的作家，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听漏》聚焦考古与青铜器，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对话，引领读者穿梭于辉煌文明与复杂人性之间。

《听漏》的核心线索是青铜重器九鼎七簋。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悬挂在考古界和读者的心头。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将我们带入了这个谜团之中。九鼎七簋，为何缺一簋？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关注，也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刘醒龙巧妙地这一历史之谜与现实相结合，引领我们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复杂。

小说主人公马跃之，这位曾立誓不再涉足青铜器研究的专家，被一封神秘的预警信拉回到考古领域。这封信挑战了他对自己承诺的坚守，也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对青铜文化的热爱与追求。面对九鼎七簋的谜团，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显得尤为艰难，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挣扎。

围绕九鼎七簋的，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人心与利益的复杂纠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饱满，他们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在九鼎七簋的谜团中相互交织、碰撞。有人视九鼎七簋为进身之阶，不惜一切代价争夺研究成果；有人借职务之便私藏文物，企图谋取私利；还有人以文物设局窥测命运，将九鼎七簋视为改变自身命运的钥匙。这些人物的刻画，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层次，也增强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性，在利益面前，有人坚守原则、不屈不挠，有人则背叛信仰、堕落成泥。

听漏工，这个神秘的职业，在小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聆听水流的声音来判断地下管网的漏点。而在《听漏》中，听漏工被赋予了更加神秘的色彩。他不仅能够听出地下管网的漏点，还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感知到九鼎七簋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听漏工的出现，为解开九鼎七簋之谜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和帮助。他的绝技和神秘身份，让小说的情节更加曲折离奇，也让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

《听漏》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深刻反映文化传承与现实反思的作品。刘醒龙通过对九鼎七簋等青铜重器的挖掘和呈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与深邃。同时，他也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揭示和追问，探讨了他们在文化传承中的责任和担当。通过《听漏》这部作品，刘醒龙对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除了九鼎七簋这一核心线索外，《听漏》还融入了多种叙事元素和文化底蕴。小说中提到了“赠矢”“青铜方壶”“竹筒葬”“喝早酒”等多种楚地青铜器具或民情风俗的故事情节。这些元素的融入，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也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同时，作者还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场景刻画，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纠葛。这些细节的描述，让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听漏》以其丰富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这部作品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对现实的一次深刻反思，值得每一位读者细细品味。

在慢跑中拥抱人生

◎ 白羽洁

青年作家蔡崇达的中篇小说《命运慢跑团》，是他长篇新作的部分截取。题目“命运慢跑团”，实际上是小说人物黑昌给由许多个中老年男人构成的慢跑团取的名字。作品的聚焦点也在于“慢跑”，即中年主人公“我”面对父亲的去世和生活的重重压力导致人生停滞时，黑昌的出现改变了“我”处于停滞甚至是倒退的人生走向，读者和“我”都在缓步前行中逐渐找寻人生的新方向。

《命运慢跑团》借“跑”写出当代中年人、家庭和社会的缩影。核心主题“跑”笼罩下的许多小主题，如个人成长、职场压力、亲人相处等都可以归纳到不同的关系网中。在家庭关系网下，“我”与父母的相处存在问题，父亲不善言辞又怕拖累儿子，丧父后“我”以逃避的姿态面对母亲，黑昌和孩子的相处也存在问题，他隐瞒绝症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件事对儿子人生的

影响；在社会关系网下，“我”和职场上司的“交锋”充满戏剧性也令人无奈，在上司眼中，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无私奉献、舍小家顾大家的人，“我”在父亲葬礼后以工作忙为借口提前结束假期，本意是逃离故乡环境，不料这件事却成为此后上司阻挡“我”再次请假的借口，寥寥几笔，讽刺与幽默相生……诸多关系背后隐藏的大大小小的社会问题，都是阻碍人向前“跑”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命运慢跑团》不仅囊括了对众多普遍问题的暴露与思考，更具有哲学性的暗示——“慢跑”，给出了作者自己对人生问题的解答。

“慢跑”的带动者黑昌，是真正的故事讲述者。他好似故事的圆心，父亲沉闷内敛背后的点滴细节和“我”在丧礼后发生的变化，都是通过黑昌展现的。父亲对“我”知识分子身份的尊重和自豪，对母亲的维护、对自己身体是否会拖累儿子

的担忧……这些琐碎却必要的细节随着黑昌的一言一行铺展开来。透过黑昌，读者了解到的是无数个普通家庭面临的交流困境。这一切都源于作者的巧思——故事中的黑昌具有双重身份，他既经历过丧父，也是正在为儿子婚姻操心的父亲，双重身份叠加，他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糅合在其中，用乐观向上的态度讲给自己和“我”，讲给每一位读者听。随着事情来龙去脉逐渐拼凑完整，故事的基调也从最初的冷峻无奈变成了色彩拼盘，因此，读者也能够从这些渐渐有色彩的故事中找到文化和情感的共鸣。

小说没有复杂的背景和人物关系，只有一群朴实又困惑的中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徘徊、奔跑。但是，“命运就是我们跑出来的路”，不论是慢跑、慢跑还是行走，只有向前看，才能找到埋藏在路边泥土下解决人生难题的密钥。

褪去光环的真实，直面残酷的勇气 ——《南京照相馆》的叙事突破

◎ 张雍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用光影艺术进行纪念，是一项责无旁贷的使命。作为抗战史上最为惨痛的民族记忆之一，南京大屠杀一直是抗战电影聚焦的核心议题。

申奥导演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中的主人公苏柳昌原本是一位邮差，他并非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在生死存亡之际，苏柳昌谎称自己是照相馆的冲洗工，才侥幸活了下来。不会冲洗工作的苏柳昌是否会被人发现，构成了整部电影的第一个悬念。此外，从伊藤秀夫给苏柳昌开具的条子中不难发现，即便苏柳昌完成了此次冲洗任务，他所获得的也不过是两天的“安全期”。一旦这段时间过去，他将何去何从，无疑成了观众关注的焦点。

凭借《受益人》声名鹊起的青年导演申奥，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孤注一掷》中，充分展现了他对商业电影的精准把控能力。如今，在《南京照相馆》中，申奥依旧将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的戏剧设计，每一次的悬念生成，不仅极为娴熟，而且显现出了创作者的“游刃有余”。在“照相馆”这个戏剧空间里，每当人物的“到来”或“离开”，都会相对地改变戏剧性情境，引发新的问题。由于整个“时空”被置于战争这一极致情境之中，因此，每一次的问题都直接关系到角色的生死存亡。在故事的前半段，如何活下去就如同悬在照相馆所有人头顶的一把剑。

尽管主角团在照相馆里难以脱身，对外界情况缺乏清晰的认知，但他们能够透过胶片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城犯下的屠杀罪行。面对让人触目惊心的影像，目睹同胞们所遭受的凌辱，爱国主义情感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涌动而出。当电影进入到后半段，主角团成员的思考不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

电影里让我感到心有戚戚焉的一段对话，发生在身为演员的林毓秀和担任日本人翻译的王广海之间。当林毓秀看到自己的情人王广海仍寄希望于日本人获胜后过好日子的幻想时，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她从小学戏曲，唱的都是穆桂英、梁红玉，还没有做过“秦桧的老婆”。如果做了“秦桧的老婆”要怎么办？这样的提问既符合角色身份，避免了角色刻意搬弄深奥的理论话语，同时也更形象、更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思考方式。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这些在世俗眼中看似平凡的人，是如何义无反顾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牺牲生命。而最为关键的一项行动，便是他们深刻认识到这些胶片所蕴含的“证据”价值，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将这些胶片安全地送出去。《南京照相馆》选择的叙事策略——它并非依靠“蛮力”，而是借助技术、技巧与智慧，这样的表达方式更符合电影文本的语境。

尽管近些年的新主流军事电影不断地将战争的残酷性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但在电影《南京照相馆》里，我们依然会被其揭露的残酷所震撼——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此外，在过往的抗战电影里，我们目睹主人公凭借“主角光环”屡次化险为夷，也见证了其在“传奇叙事”的渲染下，展现出以一敌百的英雄风采。但在《南京照相馆》里，主角团就是一群普通人，他们没有“主角光环”，也没有“传奇加持”，除了林毓秀最终带着金承宗的儿子成功出逃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其中，最为凄惨的，莫过于赵宜芳和女儿金婉仪的遭遇。通过“抓阄”幸运地获得了



两张来之不易的通行证后，她们为了这次生的希望，倾尽全力做了各种努力。结果，她们却意外落入了伊藤秀夫设下的“局”，最终不幸惨遭凌辱并丧命。当看到金承宗还在庆幸着自己的妻女成功出逃的时候，我们如何能不为之落泪？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叙事策略”在讲述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中，具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必要性。因为，只有摒弃剧作法中惯用的“主角光环”和“传奇叙事”，才能真正深入揭示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本质，进而深刻体会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普通人，是如何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良知的。

申奥的《南京照相馆》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同胞如何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在影像中直面日本侵略者当年所犯下的惨烈罪行。这种“直白”所展现出的能量，正是我们在当下通过影像呈现南京大屠杀叙事所应遵循的正确路径。

固然，《南京照相馆》里也存在一些被称为“灰色人物”的角色——如担任翻译的王广海和身为日军摄影师的伊藤秀夫，他们的“灰色”特质无疑为电影增添了戏剧张力和复杂性。然而，这些“灰色人物”之所以能够被观众所接受，不仅在于他们最终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更在于影片本身对其“灰色”属性始终持有明确的态度与立场。正如电影接近尾声时，苏柳昌面对伊藤秀夫，坚定地表明：“我不是你的朋友”。在伊藤秀夫看来，他给了苏柳昌食物和苟延残喘的机会，因此苏柳昌理应表现出“忠心”。但是，苏柳昌看透了这背后是一种包含屈辱的不平等交易，所以，他义正词严地说出了“我不是你的朋友”。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命题上，影像自身毫不暧昧，也没有模糊处理，而是通过王广海的结局充分说明——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好”，不过是你当成了一条狗。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尾声，多年以后，当年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受到了审判。在处刑的那天，林毓秀带着相机来到刑场，她要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刻。此时，电影以想象的笔触，让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的金承宗、赵宜芳、金婉仪、苏柳昌等人“现身”，一起目送恶魔离开人间。这样的尾声不仅强调了本片最重要的道具——相机、胶片、相片作为一种媒介所具有的见证意义，而且通过超现实主义的表现，使受害者亲临现场进行见证。在这种双重见证之外，银幕外的观众们也在进行一场见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瓜摊上的读书人

◎ 袁家莉

本书封面磨破了边，书脊也有些脱线。我顺口问：“你也看书？”他点点头说：“闲着也是闲着。”语气很平常。

我多看了一眼，封面上隐约写着《平凡的世界》。一时来了兴趣，问他：“看得怎么样？”他擦擦手，小心地拿出书，翻到折角那页：“昨晚刚看到孙少平在煤矿那段。”说话时，他的眼神亮了一下。

我站着听他说了几句书里的事，不急不缓，语调平和，像在讲相识的老友。他告诉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上几年学，后来跟着父亲种地。但从小喜欢看小说，看邻居孩子的语文课本，借来抄，晚上点煤油灯读。现在日子好些了，就自己买些旧书，赶集摆摊带着，等顾客时翻几页。看书能让我心里踏实。

我突然有些感动。眼前这个人，日晒雨淋地守着一个瓜摊，生活并不轻松，但他却在瓜架底下，用一本旧书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买了瓜，道声谢，转身离开。回头望时，他又坐回马扎上，草帽盖住半张脸，像是睡着了。但那本书，还静静躺在他身边，沉甸甸的，压住了整个夏天的浮躁。

盛夏的午后，阳光火辣辣地晒着。街边的梧桐叶子蔫蔫的，蝉声一阵高过一阵。我从菜市场出来，手里拎着刚买的菜，目光却落在了街角那方小小的瓜摊上。

瓜摊不大，支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几块木板搭成的架子上，摆着西瓜和哈密瓜。摊主是个五十岁出头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戴草帽，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像是在打盹儿。脚边放着一个塑料水壶，旁边竹篮里装着几个没吃完的馒头。

我走过去挑了个西瓜。他揉揉眼，起身称重，动作慢，却很稳。称完，他抬头看我，眼神清亮。我顺口问：“这瓜甜不甜？”他笑了笑：“你放心，我种的瓜，不甜不要钱。”语气里满是自信。

正要付钱，忽然看见他身后遮阳布下，放着一

《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

秦翼、张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入考察14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探讨战争对中国电影产业及电影艺术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书中研究了抗战初期的电影生产、大后方艰苦卓绝的抗战电影宣传、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创作等内容。通过对战火中中国电影业曲折命运的生动描绘，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电影工作者不屈的精神风貌，以及电影作品在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重大作用。



《他们仨》

刘黎琼著，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十四岁少年的成长觉醒为主线，在少年十数天的经历中容纳父辈和祖辈数十年的生活历程，大开大合、收放自如的时间架构中融入了“回望之眸”与“书中书”的双重叙事，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展现一个科研家庭三代人的温情日常和精神共振。

《在集市：昆明篆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

半夏著，商务印书馆出版。云南昆明篆新农贸市场是各地物产汇聚、无数外地人打卡的网红菜市场，在这里，作者以博物学爱好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的视角，将物候、食材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写下了本书，揭示菜市场展现的生活特色及背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